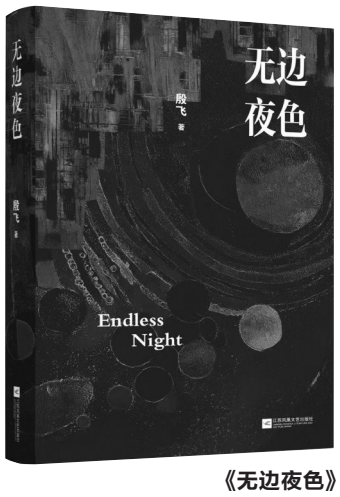
暮色中也有亮光

□汪楚红



《无边夜色》
殷飞 著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2025年1月

殷飞的短篇小说《墓友》,发表在河北名刊《长城》2025年第六期,收入小说集《无边夜色》。单看题目,令人不解。我们熟悉笔友、校友、旅友,友友相逢该是喜悦,而墓地、墓碑、墓园,墓墓皆与悲恸关联,何时有过“墓友”一说?难道连安葬入土也需提前规划,寻觅合适的“邻居”?这看似奇怪的搭配、奇妙的小说命名其实是作者设下的文本解谜邀请。

深入阅读,我们发现小说很显著地采用了一种生死互文叙事结构。所谓“生死互文”,指的是有意模糊生与死的界限,使二者在叙事中相互渗透、相互阐释。在这种结构中,生者与死者世界不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领域,而是交错重叠的叙事空间;生者的行为指向死亡,而死亡又反过来赋予生者行为以特殊意义。通过这种生死互文的叙事框架,殷飞巧妙地将多组二元对立概念交织在一起:生与死、真实与虚构、物质与精神、孤独与陪伴。这些对立面在文本中不断相互映照,产生既矛盾又统一的叙事张力,使小说在不动声色的叙事之外,呈现出更为深刻冷峻的一面。

按照解谜的思路,“墓友”这一概念本身,其实就蕴含着生死互文的意味。修十一是住家护工,照顾的老人处于生命的暮年,这使他比常人更接近死亡的边界。而“无妻无子”的张甲地,作为一个孤独老人,生命已接近终点。二人在陵园相识,一同购买墓地,成为彼此在死后世界的“邻居”。“墓友?对,以后就是墓友了。”修十一说了一句,张甲地紧接着重复了一句。疑问句转为肯定句,不仅是形式的变化,还表明了一个从不确定关系到确立契约的过程。在没有任何书面协议的情况下,两个陌生人因“墓友”二字而建立了某种超越常规的关系纽带。

说到修十一与张甲地的初识地东川陵园。东川陵园在旷野,两人在陵园中漫步,“在区域里转悠,就像在挑选居住小区一样”,在他们看来,死者的“居所”与生者的住宅是可以并置的,墓地不仅仅是死后归宿,也是“生活空间”。细腻的环境描写暗示了这一点:“四处潜行着安静,偶尔一声鸟鸣划破这静得空灵的地方。”这种介于有声与无声、活力与静谧之间的状态,正是生死交界的隐喻。

而小说中的虚构与真实之间的界限,又何尝不是一种生死互文?张甲地虚构的生活与身份,高档别墅、国外的儿子、体面的退休生活,这些都是他对现实困境的一种超越,是在生命维度上对死亡维度的一种抵抗。而当这些虚构被揭穿,张甲地的真实身份暴露无遗时,他已经从生者世界离去。这种虚构与真实、生与死的双重转换,不仅增强了小说的戏剧性,也是对生命本质更深层次的发问:在死亡的永恒真实面前,生前的虚构身份是否还有意义?

小说中最动人的一幕,莫过于张甲地在临终前汇给修十一的儿子十万元用于买房。这十万元,解决了修十一家庭的经济困难,让其一直以来的购房梦想得以成真。对张甲地而言,帮助修十一的儿子,在一定程度上,是满足了他对家庭生活和代际传承的渴望,由此实现了一种超越血缘的精神父子关系的建立,也是对其孤独终老的某种补偿。更为关键的是,张甲地选择在去世后才让修十一知道这笔钱的来源。如此一来,这笔钱不是施舍,也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馈赠,而是成为一份没有索求需要、没有回报可能的纯粹给予,成为生死之外友情的延续。而后修十一在张甲地墓前的低语:“兄弟,没几个月我也会来陪你”,即是对这种情感的回应。他知道生命的脆弱不堪,知道死亡的不可避免,却也深知慰藉在何处、永恒的连接在何处。我们知道,人际关系往往基于血缘、利益或共同经历,但修十一与张甲地既不是家人,也非传统意义上的朋友,他们的情感建立在对死后归宿的共同规划上。这种超越常规人际联结的关系模式,尽管源起于死亡规划,在本质上,却是对生命连接的一种创造性探索。

因而,小说在呈现老年人不同的生存困境之外,借助“墓友”这一概念的开掘,想探讨的是在困境中寻找尊严与从容的生死哲学。如果生前并不如意,要如何体面死去,要如何坦然从容地面对死亡?两位墓友表现出的是一种超脱且成熟的心理状态:死亡不是生命的对立面,而是生命意义得以完成的必要部分。生与死是相互渗透、相互映照的。若将《墓友》置于殷飞的整体创作中考量,小说结尾的句子“暮色渐渐昏暗,修十一心里充满古怪的亮光,但又无比沉重”,精确地呼应了其小说创作的核心关怀,即在“迷夜”中艰难寻找“微光”。这种既不绝望也不盲目乐观的态度,这种察得暗色却坚持寻找微光的努力,正是殷飞作品独特魅力所在。

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

□王淼

《余生:清代宦官社会史》
[美]戴懿华 著,杨兰銮 译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2025年11月

在一般人的印象中,宦官大抵是一群身心俱陋、穷凶极恶的变态之人,这当然是从一些影视剧和文艺作品中所得来的印象。那么,现实生活中的宦官究竟是怎样的呢?他们是怎样走上阉割之路的?他们又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呢?美国汉学家戴懿华博士的《余生》,即是一部关于清代宦官的社会史。

作者的关注点并非那些位高权重的权宦,而是将她研究的目光聚焦在大多数普通宦官的身上:他们身处皇宫,但从未登上权力巅峰,也从来没有享受过权力带来的快乐;他们的身体与人格遭到双重摧残,是一个被侮辱与被伤害的群体;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,却具有更加普遍的意义。正是通过戴懿华笔下的他们,我们看到了宦官这个群体的真实面貌和日常生活。

在中国古代的史料中,宦官一直是一个被人忽略的群体,因为他们身份卑微,很少有人关注他们的日常生活,更没有人专门记录他们的生平事迹,这使得宦官的身世扑朔迷离,而他们的人生也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。戴懿华博士写作《余生》,大多是利用史料的边角旮旯去发现其中蕴含的丰富细节,比如:宫廷档案里的人员招募、宫廷开资、管理条例、违纪记录,以及墓志铭、皇家布告,乃至少量的口述自传、十九世纪西方旅行家的手记、末代皇帝溥仪的回忆录……这些史料虽然并非以宦官作为主要的叙述对象,其中却夹杂着大量与宦官相关的片段和信息。而戴懿华即以这些零散的片段和信息为线索,从中抽茧剥丝、寻根究底,高度还原了宦官的生活状态——从他们的净身,入宫当差,一直到他们被裁撤、退役或死亡,可谓完整再现了宦官的人生历程。

作为一种历史现象,宦官无疑是一个很古老的职业,自然也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和演变。时当清代,尽管清廷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前朝的教训,对宦官的人数和职能均做了一定的限制,但宦官依然在宫廷中扮演着主要的服务角色,而每一个皇帝对宦官的不同态度,也决定了他们权力的大小与境遇的好坏。在一个推崇孝道和看重传宗接代的儒家社会,宦官放弃世俗生活的快乐和权利,肯定自有他们的苦衷,他们或者为生计所迫,或者出于对荣华富贵的幻想,但大部分宦官之所以选择净身,却是遭到了欺骗与挟持。表面看来,清廷只负责宦官的筛选,与贩卖和阉割无关,实际上他们与人贩子、刀子匠和净身者的家人构成了一个产业链,他们既各取所需,也各获其利,宦官本人则不过是供他们操纵或利用的棋子,宦官亦因之沦为“社会的弃儿”。

统治者使用宦官管理宫廷,原本是血缘宗法制度的产物。宫廷对于宦官的职能有着两种明确的定位:一为确保皇室血统的纯正;二为宣示皇权,打造一批不受血缘纽带或社会责任束缚的忠诚而恭顺的奴仆。统治者认为,只有高度依赖主子过活的宦官,才能够做到这一点。然而,宦官也是人,也有七情六欲,虽然他们身体残缺,却又很难成为单纯的工具。所以,当皇帝利用宦官强化皇权、制衡文武百官时,宦官也往往因缘际会、反客为主,成为实际的获利者。而且宦官因为有着“侧近政治”的便利,他们可以通过辅佐外戚、或者与内廷的盟友联手,与外廷的大臣争权夺利,在常规的官僚体系之外玩弄政治伎俩。也正是因为这样,清廷才会对宦官又用、又防,既不相信他们,却又离不开他们,这种矛盾的态度贯穿了清朝的始终。

诚如戴懿华所言,宦官在围绕皇帝和后宫讨生活之余,他们还一直试图突破宫廷规矩的束缚,去打造另外一个平行的世界。这是一个只属于太监的世界,他们在这个世界中喝酒、赌钱、打架、抽大烟,乃至收养子女、组建家庭……宦官一方面扮演着皇室为他们设定的角色,一方面争取着自己想过的生活,举凡世间正常男人所做的事情,他们都想尝试一下——在刀子匠手起刀落的那一瞬间,尽管阉割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宦官的人生,但他们依然向往着过上正常的生活,而我们从中所看到的,又何尝不是宦官伤残身体背后尚存的一丝人性底色呢?

如果历史变成解谜游戏

□林颐

《刺秦:重新认识秦王朝》
李开元 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·世纪文景
2025年8月

“荆轲刺秦”的故事广为流传,《史记》的描写,高潮迭起,精彩至极。但是,我们大多数人都只是停留在叙事层面去领略过程,很少人拥有李开元这样的思想意识,把这篇名文当作解读秦汉历史的密码。

在新作《刺秦:重新认识秦王朝》里,李开元把历史研究变成了解谜游戏,像侦探一样去推理各种谜题。他句句推敲,厘清细节,并延展到相关历史。

李开元结合著名汉学家宫崎市定的研究,认为这篇名文是口述史料的典范,这位口述者就是被人们忽视的、“在舞台演出中多余的人”——御医夏无且。夏无且在刺杀现场,目睹一切发生,他还以药囊投掷荆轲。据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“太史公曰”记载可发现,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与公孙季公和董生有交往,这两人与夏无且又有交往,夏无且把事情讲给了这两人听,他们又转述给了司马谈,这才变成了《刺客列传》之荆轲刺秦王的故事。

也就是说,“荆轲刺秦”基于亲历者的口述,它的真实程度是很高的,如果重新推敲和审视出现在故事里的各种细节,可以揭开哪些历史真相呢?

比如,文中写道“时惶急,剑坚,故不可拔”,秦王在左右的提醒下,“负剑,遂拔以击荆轲,断其左股”。在后人看来,这个细节很值得怀疑。导演陆川为了拍摄需求,试验过,“背在背上,根本拔不出来”,导演陈凯歌采取的策略,是安排一位太监,在秦王奔逃的途中,顺手摘掉了秦王的剑鞘,于是秦王挥剑砍击荆轲。那么,这难道是《史记》乱写的吗?

李开元怀着这个疑问,探访文物学家孙机先生,通过孙先生《玉具剑与璏式佩剑法》这篇宏文,才剖解了秦汉时人佩剑法的根源,也解开了“王负剑”的谜题。原来,这跟秦汉贵族的服饰装扮大有关联,用剑带贯璏配长剑者,只有将剑鞘沿着剑带推至腰身后,使得剑鞘前短后长,才能将剑拔出来,这就是秦王“负剑”当时的语境再现,是历史的生动还原。

继续推敲,这故事里还包含着很多谜团:太子丹送荆轲,为何在易水?督亢在哪里?荆轲为何想要生擒秦王?荆轲原先等待的刺客是谁?……李开元运用“文本记载”与“实物证据”交叉验证的方法,逐步拨开历史迷雾。《刺秦》的写法,很像侦探对比证词与现场痕迹,逐步完成了充满逻辑链的“线索拼图”,让读者也参与到解谜游戏之中。

李开元的这种写法,其实由来已久。比如,他的代表作《秦谜:重新发现秦始皇》,围绕嬴政身上的各种谜团,采用侦探推理的形式探讨学术疑案。这些谜案的证据主要来源,一是考古的遗址、遗物,一是典籍记录的蛛丝马迹,李开元将两者相互对应,仔细推敲,仿佛完成法律的鉴定和取证工作。“历史是什么?历史是基于史料对往事的推想。”在李开元看来,不论古今,人性是相通的,如果事情违反常规,要么其中有隐情,要么原有的判断是错误的。

除了“荆轲刺秦”,《刺秦》书中还有对李斯《谏逐客书》、对《史记》另一名文《鸿门宴》等的解读。李开元还提出了各种有趣的假设,比如“刺秦”若果成功,局势会变得如何?以此分析了当时秦朝各派势力的博弈,为关键问题列出了多种可能。

从《秦谜》到《刺秦》,李开元提供了一种新鲜活泼的历史研究方法,构建了一个多元的历史空间。他不把历史变成材料堆砌的学斋、封闭式的“知识罐头”,而是变成一个充满线索、等待探索的“解谜现场”。传世文献是“目击者证词”,考古实物是“现场物证”,合理推想是“侦探的逻辑链”,他努力达成历史研究的多角度、多维度,突出其开放性,呈现了无数种可能,启发读者的思维。